

王向清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1)11-0014-06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方克立认为,在当今中国像冯契“这样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兼通古今中西,融贯儒释道,能够自由地出入于形上学、知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哲学领域的大师级的哲学家为数不多;能够在各个领域都提出许多深刻的、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并且坚持一以贯之的哲学立场,建构一个真、善、美统一的自身圆融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为数更少。”<sup>[8]</sup>(P396)

其次,“智慧”说是具有理论创新和逻辑体系的哲学著作。凡称得上建构了逻辑体系的哲学著作,应当接着先哲没有涉及或虽有涉及但没解决好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围绕特定的问题概括出新范畴,并通过一定的逻辑结构把阐述特定哲学理论的范畴、命题、论证有机地联系进来,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智慧”说完全可以说是具有



关于“智慧”说的学术贡献,正如许全兴所指出的,“智慧”说“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精华,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智慧说’不同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宗旨,有自己的范畴和体系,有体现作者人格的鲜明个性,它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可以说,直到冯契的‘智慧说’发表

冯契从中国古代哲学的实际出发,以广义认识论为理论根据,论证中国古代哲学蕴含了丰富的认识论,驳倒了上述流行观点。在他看来:以广义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中国古代哲学,就会发现它蕴含了丰富的认识理论。“在中国古代,从孔墨开始,就已在讨论感性和理性思维的关系了。而庄子已对‘感觉能给予客观实在’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客观真理’提出种种责难。所以不能说中国人不关心前两个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同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相比,曾经历了更长时期的持续发展,因而倒是较多和较长期地考察了上述后两个问题: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理想人格如何培

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贯穿了“智慧”说的精神,把知识和智慧统一了起来。冯契以广义认识论即“智慧”说为根据,认为知识和智慧都是认识论应探讨的问题,并论证了“转识成智”即知识可以上升为智慧,从而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紧张、科学和人生的脱节。这为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

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另一个贡献是在肯定中国近代哲学传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并论证中国近代经历了一场哲学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津津乐道,而对体系性不强、思想多变、

所谓传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点的伦理道德学说、政治法律思想、教育理论、文学艺术理论、性格气质特征、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总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换言之,传统总是特定社会的传统,传统具有时代性、变迁性。因此,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对中国近代社会反映的近代哲学同样也有着自身的传统。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注重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发掘、阐发,而对近代哲学传统没有给予肯定和总结。冯契率先对近代哲学传统的肯定和总结,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最主要的积极成果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还取得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两项成果。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最具标志性的是其学术范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传统的哲学范畴获得了新的内容;二是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三是近代哲学的独特创造。

冯契先生不但在“为学”领域建树颇丰,而且在“为人”方面足为学界楷模,成功地将哲学理论化为了自己的德性,真正做到了“道问学”、“遵德性”的统一,实现了德性的自证,践行了自己提倡

责任编辑:杨海英